

2009年是五四運動九十周年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周年、六四事件二十周年。凡有關五四運動、新中國發展道路、1980年代變革與天安門民眾抗爭運動的文章，我刊將優先安排刊出。敬請海內外學者踴躍賜稿！

——編者

如何成就國家的自主性？

蕭濱在〈中國的國家再構建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12月號）一文中，從國家的有限性、有效性和自主性三個層面審視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國家構建歷程，其中「自主性」問題是這篇文章的着力點。作者指出，維護國家自主性不僅需要抑制勾結型國家的蔓延之勢，而且需要推動政黨—國家的轉型，而只有全能主義政黨向執政黨轉型，國家的自主性才能真正確立。

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有目共睹，其中執政黨利用其全能主義的力量，發揮了經濟發動機的作用，因此，比較成功地駕禦了三十年的市場轉型。在這一進程中，全能主義也有所衰退。但是，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，全能主義與市場化重疊或交叉，於是出現了作者所指出的政府行為商業化和政府俘獲現象。政治力量始終都是通過直接參與經濟、干預經濟活動過程去推動市場化進程的，不僅計劃經濟的觀念和方法在潛意識中根深蒂固，更關鍵的還在於市場的誘惑力發揮了很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大作用，讓政治力量直接從參與經濟活動過程中獲取利益。

文章提出的結論是：只有憲政民主的國家，才可能是自主性的國家。全能主義政黨如何實現轉型，將是中國改革今後面臨的最大考驗。

樊歌 杭州
2008.12.27

值得深入研究的糧食問題

楊繼繩在〈大躍進中的糧食問題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12月號）一文中指出，在饑荒最嚴重的時期，糧食儲備依然夠1.4億人吃一年。死人最多的1960年，糧食出口272萬噸。這些數據顯示，對於當年的糧食分配不公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首先是糧食出口問題，有必要說明兩點：一是應該用淨出口量比較客觀一點，因為當年還有少量糧食進口，如1960年扣除進口後，實際糧食淨出口265萬噸；二是糧食出口流向，過去官方對饑荒的解釋是前蘇聯迫債與自然災害，那麼這些糧食是否主要出口到前蘇聯？如果是，在一定程度上應支持官方的說法；如不是，則應還前蘇聯一個公道。

其次是當時國家的糧食儲備制度問題。由於嚴格的控制，糧食庫存是不能輕易動用的。甘肅省張掖地區在1959年底出現餓死人事件，地委向省委請示動用國家糧庫救災，但省委指示在第二年2月前不許開倉放糧。在1980年代初期，張一弓的小說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》描寫了面臨饑荒帶來的死亡，一位農村幹部讓農民到國家糧食倉庫奪取糧食，自己挺身而出承當法律責任。這是對這種儲備制度的控訴。

第三是有效的糧食庫存問題。糧食雖然存放在倉庫中，但由於運輸困難，因此在救急時無法派上用場。當時四川省從少數民族地區調出的糧食，運輸成本是銷售價格（國家牌價）的十倍。在研究當年糧食庫存時，如果有庫存的分布情況，就能夠更好地說明問題。

李若建 廣州
2009.1.3

張藝謀式的美學

〈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文化批評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12月號）一文從「奇觀美學」的角度進行分析，認為「一個被

奇觀所統治的社會是一個文化上集權的社會，雖然它的表現形式不像政治集權社會那樣直接和暴力」。

確實如此。在一個集權的社會中，美學是集中化的。美，在政治的主導下，被理解為整齊劃一的宏大敘事。唯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彰顯一個可以隨意揉捏、變形的集體。在集權美學中，生命個體不但是毫無意義的，而且是有害的，因為會破壞集體的統一性。所以，集權美學布置中的場景，不會有個人。

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中，我們再次看到浩蕩的集體行動，而且這種行動披上了一層「文化」的面紗。張藝謀傾盡全力地把他對「中國元素」的一切可能想像，拼命堆上舞台，五彩斑斕，色彩繽紛，熱鬧非凡，場面是那麼宏大浩蕩，演員是那麼整齊劃一，氣氛是那麼熱烈激昂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看不出任何真正的中華文化精神。

張藝謀式的美學，是與這個社會的政治特徵緊密合拍的。它讓人產生的不是自由的愉悅感，而是一滴水融入大海之後的震撼。正像作者所說的，我們必須對奇觀進行反思和改造，「讓它為民主的社會實踐服務，而不是成為維持現狀的工具」。

陳愚 北京
2009.1.2

中國是「發展型國家」？

阮思余在〈從發展型國家走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？〉（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12月號）

一文中對發展型國家的弊端，尤其是針對中國的問題及其走向做了詳細討論，並進行了批評。然而，筆者認為，發展型國家首要特點是強調動態效率、民族利益和長遠利益，而不是自由主義所強調的靜態效率、個體利益和短時利益。這一點在對待「比較優勢」方面，表現得最為突出。

中國實際上到了1989年才有真正的產業政策，一種類似於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理性計劃才真正得以展開。更嚴格地說，只有在1990年代稅收改革、機構改革和金融改革推行以後，中國才真正擁有一個可以較好推行策略性產業政策的國家經濟機構。

此外，中國還存在着一種體制外的發展模式，它根據「比較優勢」，通過市場來選擇產業發展。由此，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型產業遍布中國沿海地區，而中國也被美其名曰「世界製造廠」。顯然，這種「比較優勢」的效應是短暫的，面對目前的金融海嘯，其致命缺陷暴露無遺。中國的GDP主義並不完全是策略性產業發展的結果，它更是市場自發發展的後果。與其說GDP主義和地方政績工程是策略性產業政策引導的結果，不如說是國家經濟官僚缺乏理性計劃的結果。

石德金 廣州
2009.1.4

民主先於民主社會主義

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的多篇文章討論了國家轉型這一大問題，非常深刻。但有些文章把民主社會主義作為中國

國家轉型的願景，多少有些一廂情願。

歐洲社會民主主義之「第三條道路」，是「第一條道路」之自由主義體制吸收了「第二條道路」之社會主義價值的產物，其體制基礎是自由民主，「粉紅色歐洲」是白加紅的產物。勃蘭特(Willy Brandt)式的聯邦德國社會民主主義，正是以戰後西德的自由民主轉型為前提的。因而，民主社會主義的關鍵是「民主」，而不在於「公正」、「團結」等價值。中國要想逐漸邁向民主社會主義，無法不涉及民主轉型的政治改革。

然而，由於政治改革的遲滯，中國市場化的經濟轉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軟經濟、硬政治的「共產資本主義」(李金銓語)模式，其基本特徵是「威權推動市場，市場強化威權」。中國經濟奇蹟，正是緣於「威權推動市場」之國家與資本的結盟，而非姚洋所謂的「中性政府」(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6月號)。「市場強化威權」，則表現為國家汲取能力急劇擴張的「稅收共產主義」和以壟斷性中央企業為基礎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。蕭濱和吳木鑾的論文(《二十一世紀》2008年12月號)對此有深入的討論。

轉軌三十年，中國經驗對斯密(Adam Smith)和馬克思的理論都提出了挑戰。中國經濟已非「轉軌經濟」那麼簡單，一種計劃與市場、國家與資本、公有與私營結合的新共產主義經濟模式正在成型。

高力克 杭州
2009.1.10